

# 個人自述



盧定濤 1943 鋒社

2013年是我從培正中學畢業後的70週年。衷心感謝在今年10月澳洲悉尼培正同學會的大會上，由徐兆敏會長以及新到任的中國駐悉尼總領事（大使銜）李華新校友為我進行了隆重的金鑽禧加冕儀式并頒發了證書。此後，還要求我將培正母校教育對我一生88年來的影響向校友們作個簡要彙報。

我一生的教育主要是在日本侵華戰爭期間多次逃難和奔波中渡過的。1937年我從蘇州的一個小學畢業。由於日軍進攻上海，我隨父母逃難到了廣州。接着，又因為日本飛機對廣州的瘋狂轟炸，1938年舉家又逃難到了澳門。在那裡我幸運地考進了培正中學，插班初中二年級。從此，開始接受了培正的系統和良好的基礎教育。“紅藍精神”至善、至正的校訓成為了我畢生銘記在心，處事待人的宗旨。在澳門由初二，一直讀到高中二，曾經有過住宿和走讀。在校時既努力讀書，也熱愛運動。在學習上，我連年被評為“優異生”并編入甲班。在運動方面也是足球隊的一個守門員。記得，當時我在班中年齡較小，又比較頑皮，我曾模仿電影中的泰山，利用球場旁一棵大樹上吊下來供爬繩訓練用的長繩，從這棵樹盪到另一棵大樹上。結果有一次不小心，失手掉了下來，連門牙也崩了一塊。以後學校就規定不許再玩這種遊戲了，而同學們就由此給我起了一個綽號叫“馬騮仔”。至今還有個別老同學，以此開玩笑地稱呼我，不免讓我有些既害羞而又親切和返老還童的感覺。

在此，我還要着重一提的是，當年培正所聘用教師資歷和品質，教學方法和教材選用都是要求較高的。尤其是在個人品德方面，大部份教師們并不計較個人的得失，而是一心一意為培正來培育好年輕的一代。因為據了解，他們按資歷有的是可以任教大學的，名氣和工薪都會較高，但他們還是願意到培正來任教中學。他們教學選用的教材，以當時高中二年的英文、數學、物理、化學的課本來看，基本都是用美國大學一年級的教材。他們一方面是希望同學對外文課本有直接閱讀能力，更重要是要提高同學的學業水平，好讓高二能有大學一年程度，要讓培正畢業生優於其他中學，其用心可見於此。教師們不僅在授課前精心備課，在課堂授課時，更是深入淺出，諄諄教導，使學生易於理解和吸收。在課餘時間還樂於幫助同學解決書本中疑難的學術問題。因此，上課時彼此是師、生關係，下課却是朋友。這種亦師亦友的關係，有的幾乎一直延續到數十年之久，不得不使人十分讚歎！

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，日軍攻佔香港。澳門雖未被日軍直接佔領，却被嚴密封鎖和包圍，對學校正常運作和學生安定學習構成嚴重影響。因此，培正、培道學校當局決定聯合在桂林和坪石兩地分別成立兩所培正、培道聯合中學，簡稱培聯，以適應當時實際情況。我和幾個同學則決定離開澳門，冒險偷渡日軍佔領區，成功到桂林培聯中學繼續攻讀高中三。桂林培聯當時係以培道教職員為主進行組建，校長是楊元勳。師資亦數精幹。記得，我們高三英語老師是一位美籍華裔混血單身女士周紉蘭老師，她受美國浸信會差遣來華，長期在培道任教，是一位十分資深的教師。人們都尊稱她為Miss周。她畢業於美國University of Texas。出於對她的敬仰，也對日後一些同學赴美美國留學，有一定的影響。再就是我們的數學老師周潤堂也是一位出色的數學家，早年畢業於中山大學，曾任教於母校，人稱他為“鬼才”。在他的教導下，使我受益良多，讓我愛上了數學，也成為他的一個得意門生。記得我高三期終畢業時，數學科的總成績取得了99.5分。一時引為佳話，也給我留下一個難忘的回憶。

在1943高三這一年，日本佔略軍愈來愈迫近桂林，日機對桂林轟炸也日趨頻密。經常為了躲避空襲，我們還要帶上矮凳到附近山洞去上課。這一年我就在這樣的兵荒馬亂中，接受了對學生的簡單軍事訓練，讀完了高三，還通過了國家統一的會考，最後順利地畢業於桂林培聯中學。

為了追求升讀大學和避去日本可能對廣西發動的進攻，我和兩位桂林培聯的同學一起，不畏艱險，大膽乘坐以木炭為燃料的老爺客車，途經無數盤旋險阻的山路，輾轉趕赴四川，報考了重慶大學和中央政治大學并獲得取錄。我念的是機械工程系，一心認為自己在大後方總可以安心念完大學了。誰知1944年，由於日軍進迫貴州，重慶告急。蔣介石提出了“一寸山河，一滴血，十萬青年，十萬軍”的口號，號召知識青年參軍抗日。當時大後方的大、中學生抗日意氣激昂，積極響應，為了保家衛國，毅然投筆從戎。我當時正是大學二年級，深感國家存亡，匹夫有責。美國作為中國盟國也及時派遣了一批軍事顧問以及空軍的第14航空隊來華并肩協助抗日。為此，急需英語翻譯人員配合開展工作。由於培正給了我們較好的英語基礎，因此一些校友們都積極報名參加了軍隊翻譯官。我的軍階是中尉，被派到美國14航空隊的貴州前綫機場。主要任務是配合中國防空情報網的對日作戰資訊的傳遞和翻譯工作。機場所駐機種有：驅逐機P-40, P-51, 偵察機P38, 輕型轟炸機B-25 以及一些運輸機C-45 & C-46 等。至於14航空隊的總部則設於雲南昆明附近的陸良機場。那裡除駐有戰鬥機與中型轟炸機外，尚有當時最先進的遠程重型轟炸機，如B-19, B-24 和B-29（超級空中堡壘）等。而二次世界大戰最後，1945年美國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彈，迫使日本投降的使命也正是由B-29型飛機來完成的。

1945年9月，日本正式宣佈投降，抗日戰爭勝利結束。所有參軍翻譯官復員回校，我亦回到重慶大學繼續供讀。1946年隨家回到廣州，借讀於中山大學。1948畢業，取得機械系學士學位。1949年1月赴美留學，就讀於前培聯英文老師Miss Chow 曾讀過的University of Texas (Austin) 作為機械系的碩士研究生。專題為：空調、冷藏新技術的研究。1950年6月，經過了我抓緊一切時間和一番艱辛努力後，終於順利地取得了碩士學位。當時，中國已經全部解放。新中國政府積極號召海外留學生早日回國參加祖國建設的任務。培正“至善至正”的精神又一次鼓舞着我，認為青年人一旦學成，匹夫有責，義不容辭，應為祖國貢獻力量。與此同時，我要特別感謝的是我的未婚妻鄒夢周女士，她是早年革命烈士的後代，解放不久便已回國服務。在她的積極動員和鼓勵下，我終於決定在同年7月份和一批留美學生們搭乘郵輪一起回到香港。當時我父母和弟妹們都在香港定居，在那裡我和未婚妻結了婚。和父母短暫團聚後，1951年1月不顧他們的反對，決心離開香港，到祖國最需要也是物質條件比較艱苦的山西太原，參加了中國第一重型機械廠的建設工作。以後服從分配，先後輾轉在設計院和建築科學院工作，做出一定的成績，也為祖國貢獻了自己的力量。但由於自己過去歷史和家庭背景比較複雜，免不了在政治運動中受到審查和批判，但最後總算是搞清了并獲得了平反。在國內24年期間我和培正母校沒有連繫，而國內也沒有校友會的組織。我和父母也不便多作聯繫，以免造成麻煩。

1975年7月我和家人被批准回到香港。在那裡我才再一次感受到自己父母弟妹的大家庭，和培正兒女紅藍精神的溫暖。為此，我積極地參加培正班社和母校的聚會。工作方面，我在香港擔任機電設計（Consultant），前後共20年。既參與了不少香港的大型和高層知名建築的機電設計，也積極參與國內各大城市大型建築的機電設計。有機會讓自己所學的知識和國內多年工作經驗，能為香港特區以及祖國繼續貢獻自己的力量。回顧這一切，對得起國家也對得起自己，內心總算感到安慰。

1995年我從香港退休，全家來到澳洲、悉尼。這裡既有中學（培正），大學（中山大學/華南理工大學）的“校友”，還有新結識：唱歌的“歌友”，跳舞的“舞友”，打乒乓球的“球友”，加上健身會的“健身之友”，這麼多的朋友比我在工作時接觸的人要多，面更廣。我在各個組織活動中，待人處事，仍緊記“至善至正”的教誨，做到積極參與，盡力助人，多做貢獻。有了這一理念的支持，使我和夫人退休後，能保持心情開朗，身體健康，生活充實和快樂。目前的希望是我和夫人能繼續保持健康的身体，創造一個在國內工作24年，在香港工作20年，退休到澳洲後，再活多些年，能超過和刷新以前在國內24年的新記錄。